

《哈姆雷特》在中国： 朱生豪和卞之琳的译本比较

□ 王汇宁（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作为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经典剧作，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今，《哈姆雷特》在中国涌现了逾二十种汉语译本。其中以朱生豪先生与卞之琳先生的译本最为典型、具有影响力。本文意图考察朱先生翻译的版本和卞先生的区别，基于比较文学中变异学的观点进行比较分析，一窥莎士比亚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译介观点中，透视“文学他国化”体现的不同文化心态。

【关键词】《哈姆雷特》；变异学；翻译；译介学；文学他国化

一、相关研究综述

纵观中国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史，莎士比亚可能是为数不多几位被中国学界研究最多的外国作家。中国从“五四”前后到21世纪初，有关莎士比亚的研究文章逾1500篇，而在1975年以前发表的有350多篇，1976—1985年发表约600多篇，1986年—1988年发表100多篇，1989—2003年发表600多篇。自改革开放以来至2009年，国内每年发表的莎学论文都居外国作家之首，并出版莎学专著三十多种。1978年至今，《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等基本主要外国文学刊物上所发表的莎学论文达到150多篇。中国高等学校学报上每年有关莎学的论文也有三四十篇。

而在翻译学界，出版了梁实秋、方平、朱生豪等人翻译的莎士比亚文集多种，出版莎士比亚辞典6部。张君川、孙家琇等都出版了有关莎士比亚的辞典，张泗洋还出版了《莎士比亚大词典》。建国以来的60年间，在莎士比亚翻译研究方面，中国学者共发表了150多篇翻译研究论文。国内曾经刊登莎学文章的学术刊物达几百种之多。莎学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外国文学研究界的“显学”。

而作为莎士比亚经典剧目的《哈姆雷特》同样一直是研究热点。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哈姆雷特》被译介到中国以后，这部经典的话剧作品在现代中国文学接受史上就呈现出多种样貌。根据不完全统计，参考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图书，截止至2015年，已经有22种翻译版本。

散文占目前的译本的绝大多数，只有少部分是诗体译本。其中诗体译本当属卞先生的译本为佼佼者，而朱生豪先生的译本则最为散文译本的经典代表作。虽然同

为经典，但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反映出译者对于文本的不同理解。差别主要体现在两位翻译家对于素体诗和双关语的的处理，而对于莎士比亚典型语言特征的处理态度可以一窥对于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接受和关注侧重点的转移，也体现了中国对待外国文学关注点重心的转变。甚至可以说，莎士比亚戏剧的介绍和翻译标志着中华民族接受外来文化的进程与态度。

二、可比性说明

本文侧重变异研究，通过考察对于莎士比亚经典文学作品《哈姆雷特》的翻译——朱生豪和卞之琳译本的异同，文本在译介、传播、接受中所发生的变异现象。朱先生和卞先生正好代表了但是对于外国文学翻译的两种主要流派——一个强调“神韵”，注重莎士比亚的本土化，考虑广大读者的接受能力；一个强调“亦步亦趋”，重视保留莎士比亚原文的形式乃至意象，但这种意译在一定程度上天然设置了阅读门槛，也注定了其译本传播的局限性。

通过比对两种译本的不同，本文从两种不同的“求同存异”方式反思中国在面对外国文学进入中国的心态。从译介的呈现情况一窥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接受史，从经典莎剧的不同呈现方式浅谈中国对待外来文化的接受心态和阶段变化。

三、朱生豪和卞之琳在这段文本翻译差别的集中表现

卞之琳的译本注重“亦步亦趋”的翻译模式，而朱生豪则主张莎剧中国化。这反映出两位学者对于“求同存异”翻译观念的差别，而这种世界观也直接影响了他们在对待素体诗和双关语的方法论实践上。

翻译受到译入语本土文化背景的影响，有很多因素会造成译本的差异。而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无疑是翻译



诗学或当时流行的审美追求。

朱生豪先生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翻译诗学。中国传统翻译诗学的核心思想是“神似”、“化境”，强调“意”的翻译，尤其是“神韵”的传递。中国传统翻译诗学的宗旨在于“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用林语堂先生的话就是“译者不但须求达意，并且须以传神为目的”。就像中国绘画一样，朱生豪翻译的莎剧重视描绘剧本“神韵”。这种将译莎士比亚剧本中素体诗转变为散文体的翻译，是变异学中的一种转译和改编。

而强调展现原文的语言特征则是卞之琳先生采用的翻译诗学所重视的地方。随着语言学的发展，语言本身也被认为是现实考量和思想的体现，不仅仅只是交流的工具。于是，20世纪之初，语言特征的体现和保留也被作为文学翻译的标准。正如鲁迅所说，“我认为以后译本，要使中国文中容得别国文的度呈，又当竭力保持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于是再1919以后的十来年间，在瞿秋白、鲁迅等人的倡导、带动下，不少翻译家作家有意识地采取异化译法，促进了汉语白话文的最终发展成熟。除此之外，这样的风潮也进一步鼓励中国文坛产生诸如散文诗、短篇小说、自由诗等文学样式。

显然，两位翻译家不同的翻译思想是在不同翻译诗学的影响和指导下产生的。

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者自序”中，朱生豪先生明确指出自己的翻译思想为：“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透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

而卞之琳先生则在《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这篇文章中谈到，“一个广义的‘信’字——从内容到形式（广义的形式，包括语言、风格等等）全面的忠实”、“在另一种语言里，全面求‘信’，忠实于原著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做到恰到好处，正是文学翻译的艺术性所在。”

之所以他会逐字逐句地模仿莎士比亚素体诗的每个音步的韵律和节奏，是因为他觉得译者应该把握好分寸，创作和原著相当的译作。这样的思想同样也指导他翻译双关语时，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展现这一修辞的语言特色。

而具体到文本来看，在这两种翻译思想的指导下，两者对于原文中的素体诗和双关语翻译采取截然不同的

态度也就顺理成章了。

莎士比亚在原作中采用的是素体诗文本形式，且采用大量双关语。素体诗的运用更有助于反映了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形象、情感、阶级教育、社会关系以及地位。而形象生动的双关语诙谐幽默，一方面增强语言感染力，另一方面还可以达到奚落挖苦、冷嘲热讽的效果，画龙点睛般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

朱生豪为了适应中国读者阅读诉求，将素体诗转化成散文。与此同时，他对于双关语的态度也没有卞先生那么严谨，对于一些重要双关语，他也只是把基本意思表达出来，甚至于删掉很多有趣的双关语。这种删除有时还造成了消极影响，如对人物性格特征的忽略或者是语义上的误解。但基于朱先生本人良好的文学素养，其遣词造句依旧充满了华丽和美感。而在卞之琳的译本中，保留了原文语言形式，每一行诗基本上包括五个“顿”，做到尽可能相似。但也正是因为尽可能追求与原文的一致，牺牲了部分语言的流畅感。

四、两种翻译思想反映出对外国文学的心态

中国文学背景与莎士比亚文学背景的差异性，加上翻译本身的再创作特性，决定了中国读者对莎士比亚阅读情感和文化价值的认同与西方读者对莎士比亚精神的认知和解读之间存在反差。这固然可以追溯至东西文化及话语体系差异而导致的文化误读和接受障碍，还可因于“历史异代”和“现代性错位”，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对于异域文化的接受能力，反映出在接受西方文化时的文化心理状态，同时也可以反映出东西文化差异为具象表征的“文化距离”上。

莎剧的汉译和接受都受到主流诗学、意识形态、语言文化心理等的影响，在众多莎剧汉译本中，两位学者的翻译文本都是跨文化传播文化他者的典范。通过对于两位学者截然不同的翻译态度，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在处理文学他国化时候的态度差异。

朱生豪翻译的莎剧自1947年出版以来，翻译界对其语言流畅、优美多有褒扬之声。其翻译的文本具有独特的语言美及其与原文素体诗音乐性和功能的相似性，成功再现和建构了莎剧的文学文化意象和丰富的修辞手段，传递了原文的异质文化。这些内在因素再现和建构了原文的神韵，既与译入语语言文化联系紧密，又与原文文本息息相关。

除了译者本身的翻译审美取向不同外，通过两者翻译的时代差异，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读者对于外来文化心态的变化。译者翻译的重要的动力之一来源于读者的审

美期待,这也是为什么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翻译策略。外国作品在最初被介绍到异国的时候,对作品基本含义的了解就是读者的最高期待。这个时候,以译入语为出发点的交际翻译就能基本满足期待。

卞之琳翻译《哈姆雷特》在20世纪50年代,而朱生豪比他早十年。四十年代的中国人民一方面迫切对外国经典文学有着迫切期待,一方面对莎士比亚不甚熟悉。在这样的背景下,简单流畅的译本更切合需求。朱的译本响应了读者的要求,受到他们的追捧。而后观者的审美期待的提高,不满足于传统对于翻译文本内容的诠释,他们渴望更深层的解读《哈姆雷特》,对翻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更能展现原文的语言特征的复译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彼时,以原文为出发点的语义翻译——卞之琳的译本,则更能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不难见得,时代的变迁、读者的审美期待对于译者翻译行为的影响。

莎剧的翻译始终激励这很多著名的译者,一直是翻译界一个重要的课题。而在翻译家们的不断探索中,莎剧研究也在不断深入。裘克安也指出,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散文体的译本,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就不能更上一层楼。当然除了散文体译本、保留原文文体的素体诗译本以外,还有其他的译本探索,如方平出版《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诗歌译本,这些都构成了莎剧研究的重要基石。

从莎剧的传播接受效果和对异的翻译来看,求同存“异”的翻译要受到接受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诗学、语言文化心理的影响,而且“异”的传播与接受同样要受到译者文学观念差距的影响。学者翻译时,不仅要注重对原文的翻译,更要考虑如何以有效的方式翻译“异”,才能确保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接受文化中得到一定的影响力和接受度。在对于原文他者因素的保留和传承,译文再现了原文的意象美和人物形象,满足了读者对异质他者文化的需求。求异与化同的有机结合是尊重、理解和接受差异的有效途径。译本莎剧经典化取决于译本具有的与原文、源语文化和特定历史时期译语接受语境相关联的内在本质,取决于译本对原文文体、语言和文化化的化同与求异的有机结合,和中国土壤上人们对于莎剧的需求不断转变密切相关。

五、结语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翻译思想观点的差异、方法论

实践上的不同会直接导致译本的巨大差距。如何求同存异一直是跨文化交流中的难题,应该更保留原文的文本特征还是更加本土化,是每个译者都需要思考的问题。朱生豪先生的译本晓畅易懂,拥有大批支持者,但有时对原文的处理或有不当之嫌。卞之琳先生的译本尽可能地忠实于莎士比亚的语言特征,保留了原文的风貌,体现文化发展后期人们对于外国文学更高的认知诉求,但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语言的华丽。

不难看出,翻译背后体现的是文化交流中心态的转变,我们更看重什么,直接决定了我们的方法实践观点是什么。经典文本的跨文化传递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文字如何转化的问题,其背后蕴含着不同民族文化如何相互理解、如何正确交流,以及如何彼此丰富的大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 [1] 张和龙,编. 外交社外国文学研究丛书英国文学研究在中国:英国作家研究上[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5.
- [2] [日] 濑户宏,著. 陈凌虹,译. 莎士比亚在中国中国人的莎士比亚接受史[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
- [3] 刘红英,于治领,张东力.《哈姆雷特》两个译本相异性归因——朱生豪译本和卞之琳译本研究[J]. 电影评介,2010(13):106-107.
- [4]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选编. 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
- [5] 许宏,王英姿,亦步亦趋:卞之琳的诗歌翻译思想——从卞译《哈姆雷特》谈起[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33(2):83-88.
- [6] 刘洋. 21世纪中国的文学翻译:异化与深度翻译[J]. 北方文学(下旬刊),2017(7).
- [7] 张乐金.《哈姆雷特》双关语汉译的文本分析与策略评估[J]. 外国语,2016,32(5):124-130.
- [8] 杨春丽.从改写理论角度分析《哈姆雷特》的两个中译本[J]. 山花,2016(12):165-168.
- [9] 张革英.匠心独运各显千秋——评《哈姆雷特》一段独白的四种名译[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7(2):155-160.
- [10] 周晔.从《哈姆雷特》多个中译本看文学翻译中双关的处理策略[J]. 中国翻译,2008,29(6):43-48.
- [11] 段自力,著. 朱生豪莎剧翻译经典化研究[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 [12] 刘红英,于治领,张东力.《哈姆雷特》两个译本相异性归因——朱生豪译本和卞之琳译本研究[J]. 电影评介,2010(13):106-107.